

降格的普罗米修斯

——《弗兰肯斯坦》中的现代性困境

艾士薇 王梦潇

武汉大学文学院，武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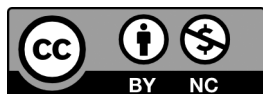
摘 要 | 作品书名采用音译的《弗兰肯斯坦》，其副标题“现代普罗米修斯”颇具深意。传统普罗米修斯的“造人者”“盗火者”“求索者”“反叛者”四重形象，在玛丽·雪莱的文本中成为流动的指涉。四种形象在现代语境下被迫降格：造物主在宗教祛魅和科学赋魅的时代走向造物魔；随着个人主义的加剧和惩罚方式的转变，盗火者演变为“盗电者”维克多和“盗磁者”沃尔顿；工具理性的魔魅化则让“知识求索者”坠为“知识滥用者”；对于“反叛者”们而言，批判理性赋予他们挑战权威的勇气，但主体性的高扬让他们忘却了自身的局限，这让他们从正义殉道者堕入暴力革命者的行列。普罗米修斯四重形象的重塑，显示着玛丽·雪莱对现代性困境的揭示。她以“现代”指代“现代性”，不仅在文学史上具有开创意义，也领先于哲学界对现代性议题的集中探讨。

关键词 | 《弗兰肯斯坦》；玛丽·雪莱；普罗米修斯；现代性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一、引言

当玛丽·雪莱为《弗兰肯斯坦》设定“现代普罗米修斯”这一副标题时，她已在宣告一个新的时代。而译林出版社在 2016 年采用孙法理的音译书名出版，也别有深意。尽管卡林内斯库在《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中指出，“‘现代’（modernus）一词在公元 5 世纪就出现了”（卡林内斯库，2002：20）。但彼时的“现代”更多是与过去断裂，指向一种新的时间意识。显然，玛丽·雪莱所说的“现代”不单是简单的时间概念，而是具有更深刻的内

涵。同样地，“现代普罗米修斯”也绝非古希腊时期普罗米修斯的翻版。厘清文本“现代普罗米修斯”的指涉对象有助于我们理解玛丽·雪莱所说的“现代”。同样，现代中文表述里的“普罗米修斯”的内涵也借助译名指涉更加广泛。

学术界多将普罗米修斯视为科学家维克多·弗兰肯斯坦：一方面他扮演着造人神普罗米修斯，赋予怪物生命；另一方面，“现代普罗米修斯”作为《弗兰肯斯坦》的副标题，意味着两者的对应关系。事实上，玛丽·雪莱笔下的普罗米修斯是一个

移动的能指，也是古希腊普罗米修斯在现代语境下的降格呈现。除了维克多，它既可以是怪物，也可以是沃尔顿和费利克斯。怪物出世前是“庞然大物”“无生气的躯体”（雪莱，2016：45，48），在被弗兰肯斯坦赋予生命后则被称作“怪物”，他始终没有获得正式的命名。然而，维克多和怪物之间的传承关系使怪物继承了弗兰肯斯坦的姓氏，因此，标题中的“弗兰肯斯坦”亦可指涉怪物。此外，沃尔顿（W）可视为维克多（V）的替身，“两个人名字的首字母W和V是叠加的关系，前者将完成朋友未尽的使命”（郝田虎，2019：6）。由此可见，三者均可对应《弗兰肯斯坦》的副标题。值得指出的是，费利克斯在反抗权威对路径上也与普罗米修斯有同质性。以上角色共同构成了玛丽笔下的“现代普罗米修斯”。文章立足于2016年译林出版社孙法理译本，通过普罗米修斯形象的模糊性和流动性呈现了一幅19世纪初的图景：人们对上帝的崇拜转向理性崇拜，甚至将拥有科学能力的人与神并论，且每个人都试图扮演时代的普罗米修斯。

二、宗教祛魅与科学赋魅：从造物主到造物魔

在阿波多罗斯和奥维德的笔下，普罗米修斯依照神的模样，用泥土和水捏造出人。玛丽·雪莱塑造的维克多·弗兰肯斯则依照人的模样，制作出怪物。于是，维克多既是普罗米修斯所创造的人类后代，又是怪物的创造者。这也意味维克多在现代语境下取代了普罗米修斯，跻身造物神之列。

古希腊的神祇被视为超自然的存在，他们主宰着自然界和人类的命运。基督教的兴起则强调了“人对上帝工作的参与”（泰勒，2016：385）。到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是上帝的同工这种观念”（泰勒，2016：385）流行开来，人类的主体性日益得到重视。随后，启蒙运动对理性的强调以及技术的迅猛发展让大众相信：人类可以通过启蒙理性自主地创造世界。至此，神逐渐失去了其主宰地位。神人关系愈发颠倒。特别是18世纪60年代工业革命在英国兴起后，人们看到了科技带来的巨大改变，科学家们日渐相信“再也没有什么神秘莫测的力量在起作用，人们可以通过计算掌握一切”（韦伯，2018：17）。在这种科学崇拜主义的话语中，“神”

逐渐隐于人类主体与客观世界的关系之中。维克多造人者的身份就显示了该时期科学对神学的围攻。

只是，成为“现代普罗米修斯”的维克多在享受主宰感的同时并没有承担造物主的责任：他虽赋予怪物生命，但未能给予怪物合理的社会身份，并因此招致灾难。他不负责任的行为本质上源于为满足私欲而扭曲的现代意识。在宗教祛魅的时代中，像维克多一样的科学家们逐渐从笃信宗教中解放出来，获得了个人主体理解世界的能力。然而，人类在给宗教祛魅的同时，也在给科学赋魅，试图用科学的方式解释世界。神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逐渐隐去时，“人也作为认知的主体站在了自然的对立面”（汪民安，2012：124），试图主宰和控制自然。自然不再是希腊时期的神性存在，也不再是中世纪上帝创造的结果，而成为了可以被人类认识、掌握和改造的对象，“科学在自然面前形成了统治性的技术构架”（汪民安，2012：122）。在这种信念的支撑下，维克多试图寻求延长生命的技术，而怪物不过是他探索生命本源的实验品，是他“可以”创造与操控的客观自然对象，在此语境下，他缺乏对怪物的怜悯也就不足为奇了。

玛丽·雪莱对怪物超常破坏性的设定，是对科学赋魅和人类主宰自然观念的反驳。在创造与被创造的关系中，怪物处于最底层，但在力量方面，他却远超其造物主维克多。凭借力量优势，怪物以其亲友要挟维克多，让维克多反被“奴役”。正如怪物对维克多说的那样：“是你制造了我，可我是你的主人”（雪莱，2016：190），在造物行为完成的那一刻，怪物与维克多之间的主奴关系就发生了颠倒。

随着主奴关系的翻转，两人“魔鬼”身份的翻转也渐露端倪。由于样貌丑陋，造物物一开始就被维克多冠以“怪物”之称，关系翻转带来的恐惧又使维克多称其为“魔鬼”“恶魔”。也正是出于这种恐惧，维克多在与怪物的对话中表现得愈发粗鲁，与他相比，怪物反倒显得文明，并称：“我愿意给你讲道理”（雪莱，2016：162）。此外，由于潜心研究造人，维克多对外界漠不关心，与之相比，怪物则更希望与他人建立起“爱”的联系。由此观之，怪物相较维克多倒更具“人性”。此时，“人”与“魔”的身份在两人身上发生了反转。

在看似“文明”与“未开化”的交锋中，披着

人形外衣的魔鬼和披着魔鬼外衣的人呈现在我们面前，两者的“魔鬼”身份逐渐模糊。就这样，神话中的“造物主”普罗米修斯在现代语境中成为“造物魔”，维克多与他的造物之间“魔鬼”的身份也发生了错位。

三、个人主义与惩罚转变：从盗“火”者到盗“电/磁”者

在赫西俄德的著述中，普罗米修斯盗取火种，使人类过上了文明的生活。此后，埃斯库罗斯又构造了由于怜悯人类而盗火的普罗米修斯，这一书写奠定了后世普罗米修斯的英雄形象。在《弗兰肯斯坦》中，维克多、沃尔顿和怪物也都以“盗火者”的形态出现过，只是他们所盗之“火”与动机大不相同。

维克多和沃尔顿都试图在现代科学的语境下重演普罗米修斯盗火神话。普罗米修斯将火种带给人类，为人类带来生存的希望。维克多则从“盗火者”演变为了“盗电者”，在电学的基础上研究造人，企图为人类带来克服死亡的希望。在沃尔顿身上，“火”又以“磁”的方式出现，他着力为人类盗取“磁”的秘密，拓展人类生存的边界。“火-电-磁”在这里具有强烈的同构性，后两者可以看作前者在现代语境之下演变的结果。

与此同时，怪物也曾尝试扮演普罗米修斯，凭借凌驾于人类之上的身体机能，帮助德拉西一家搬运柴火，送去火与希望。尽管怪物搬运柴火的举动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盗火”，但它却在行为上呼应了普罗米修斯盗火的故事，这种呼应尤其体现在关注他人困境的动机上。在怪物身上，埃斯库罗斯的普罗米修斯同情和怜悯的特质得以展现，而这恰恰是维克多和沃尔顿等现代科学家所丧失的品质。维克多缺乏对自己创造物的同情和怜悯，二人又因为痴迷盗“电”或盗“磁”而与家人疏于来往，他们强调理性、技术和实用性，却忽略了人性、情感和道德，且面临着人的工具化。这种对比凸显并讽刺了人类在现代性语境之下的局限性。

不过，在埃斯库罗斯的作品中，普罗米修斯盗取火种的动机，除了对人类命运的关注外，还包含了自我满足的渴望：通过为人类带来火种，普罗米修斯确立了自己作为人类福祉贡献者的身份。同样，怪物的行为也不全是无私的，他渴望通过帮助人类获得接纳和理解，以摆脱被排斥的孤独状态。然

而，怪物的期待却在德拉西一家的敌意中落空了，在河边救下姑娘反遭枪击的经历更是激发了怪物的恨意。为人类盗火的行为非但没有让怪物得到如普罗米修斯般的“英雄”称号，反倒助推了他成为“魔鬼”。这种差异源自二者追求相异：相较于普罗米修斯自我满足的内在需求，怪物渴求人与人之间的联结。然而，当怪物寻求情感的对象没有回应时，他内心的仇恨也被激发了出来。

怪物对情感联结的寻求反映了现代性语境之下个体的孤独感，他是玛丽·雪莱将现代人的普遍忧虑带入具体文学想象的产物。正如贾尔斯·泰勒在《现代性之隐忧》中所提出的，“人们过去常把自己看成较大秩序的一部分”，这个秩序“在限制我们的同时，也赋予了世界以意义”（泰勒，2001：3）。现代性带来的个人主义则让人失去了存在的链条，成为孤零零的个人。随着阶层划分、职业分工，人与人之间沟壑日益加深，“个体失去了归属感，在物质化的世界中失去了自己的根据”（汪民安，2012：28），现代人在动荡中处于无家可归的状态。怪物所面临的正是这种局面：他在“出生”后立刻被抛弃，并作为孤独的个体被投放在人类世界中。此后，他又由于相貌丑陋不被他人接受。这些设定使现代性的疏离感在他的身上被无限放大。事实上，在玛丽·雪莱的生活中，父亲威廉·葛德文和爱人雪莱就是维克多，怪物则是玛丽自己，她本人也是这种现代性家庭关系之下的孤独者，“通过怪物，玛丽也在表达她自己曾经的恐惧和怨气”（胡布勒，2008：195）。

“盗电者”维克多的转变也与现代语境下的疏离感有关。随着工业社会取代农业社会，家庭不再是谋生的经济单位，血缘关系淡化表现得尤为明显。虽然1831年版的维克多父母变得有人情味了，但我们仍不能忽视的是该书1818年版本中弗兰肯斯坦的家族氛围看似和谐实则冷淡。由此，创造比父子关系更亲密的关系的念头，也是维克多“盗电”造人的重要动机之一。

无论是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还是怪物和维克多，他们都因试图盗“火”造福人类而遭到反噬，但他们受惩罚的方式却截然不同。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被缚于高加索山，遭受鸢鹰啄食肝脏的肉体折磨；维克多和怪物则更多承受心灵的折磨：维克多的煎熬在于亲友死亡的源头是自己，怪物的苦楚则

是因为人类的排斥。维克多拒绝为怪物创造女伴、伊丽莎白在新婚之夜被杀的情节，意味着二者失去性与爱的对象。在现代惩罚制度下，惩罚更多的不是作用于肉体，而是作用于灵魂，“人们拆掉了断头台，性成为了目标和靶子”（汪民安，2012：101）。人与人之间情感的疏离和惩罚方式的转变深刻地影响着他们，使得他们非但无法上演普罗米修斯那般宁愿忍受肉体折磨也绝不屈服的英雄情节，反而内心逐渐扭曲，走上了成魔之路。

四、工具理性的魔魅化：从“求索者”到“滥用者”

薄伽丘的《论异教神谱》将普罗米修斯描绘为知识的捍卫者，他被绑在高加索，预示着人们被困在追寻知识的路途中，因此，“火”成为知识的象征。普罗米修斯的“知识求索者”形象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英国文学界再一次得到了延展。随着工业革命在英国率先展开，知识分子们努力寻求新的社会范式，以满足科技发展的需求，并应对其带来的巨大挑战。普罗米修斯对火的追寻象征着当时知识分子的文化处境，他们寻求知识、渴望突破自我，体现了人们对于“理性”的全然信任与崇拜：他们相信自己可以掌握并运用知识，进而改变世界、主宰世界。

霍克海默、阿多诺将理性分为“启蒙理性”和“工具理性”（霍克海默、阿多诺，2020：19，23）。但随着启蒙理性蜕变为工具理性，“这唯一能够打破神话的思想也把自己摧毁了”（霍克海默、阿多诺，2020：2）。怪物和维克多恰恰分别深受这两种理性的影响。理性最初指向人对自身和外界的理解能力，怪物最初得到的便是这种启蒙理性；但随着现代技术的发展，效率至上、实用主义等思想的推广，启蒙理性逐渐蜕化为工具理性，并深刻地影响着维克多。

通过阅读《少年维特之烦恼》《名人传》《失乐园》《帝国革命》以及偷听德拉西一家的谈话，怪物对外部和自我有了初步的理解。虽然这些认识让他对个体身份产生困惑，也让他因为有了对美与丑的认知而深受折磨。但是，这些认识亦让怪物获取了自我探索的途径，使他从自然蒙昧走向了清醒与文明。与怪物得益于人文书籍的启发相比，维克多幼时阅读的却是关于炼金术的著述，故而他心中充满着对

人类无所不能的狂妄渴望。怪物和维克多·弗兰肯斯坦接受的启蒙如同人文与科学的较量，又像是“启蒙理性”与“工具理性”“技术理性”的交锋。玛丽·雪莱对于怪物所获取的“启蒙理性”报以欣赏，却对于维克多身上的“工具理性”予以怀疑。

在启蒙时代，人们对试验和科学充满兴致，崇尚理性和成功，这推动了现代化进程。但随着科技不断进步，理性成为“工具性的支配意志”（哈贝马斯，2011：4）。人们逐渐相信可以通过控制和操纵自然来满足自身欲望和目标，作者以维克多这一形象反映了这种情形。维克多运用科技逐步掌握生命结构，并通过模仿造物主创造生命。他将理性视为实现自己目标的工具，而忽视伦理和道德的考量，进而造成无法逆转的后果。

与此同时，玛丽·雪莱还以华尔顿这一形象加深了这种认知：他怀揣探索磁场秘密的理想，孜孜不倦地学习航海知识，渴望前往未开发地区探寻，却险些丧命。和维克多一样，华尔顿也具有开拓精神，热衷于探索未知的领域，维克多沉迷寻求生命的本源，华尔顿则希望觅得自然的本源。他们都力图突破人类进入大自然的壁垒，掌控世界的终极知识，从而主宰自然。可是，他们却没有看到人类的限度。在怪物阅读的《失乐园》中，知识之树和骄傲的罪恶映射出二者在现代“工具理性”影响下的追求。

普罗米修斯形象本身有着人类文明进步的意味，但在现代性语境下，人类对知识与理性的过度崇拜则让普罗米修斯精神走向另一个极端。从启蒙运动开始，现代性的话语处处都在树立理性的权威，并将理性视作知识积累和社会进步的源泉。人们用理性祛魅，将神驱逐在生活之外，理性仿佛代替了上帝在西方世界的地位，成为别样的魔魅。韦布洛夫斯基指出：知识“是祝福，但也可能是毁灭，如果不认真地限制它、控制它”（韦布洛夫斯基，2020：56）。相较于怪物有限度地汲取人类知识而觉醒，科学家维克多则展现出对知识无节制的摄取。通过塑造维克多和华尔顿两位“现代普罗米修斯”对知识的滥用，玛丽·雪莱书写着理性傲慢的危险。

五、生成批判与高扬主体：从正义殉道到暴力革命

18世纪70至80年代，狂飙突进运动的兴起显

示着文学家与当时秩序的决裂。18世纪与19世纪相交之际,启蒙运动和欧洲民族革命反映在文学创作之中,普罗米修斯被看作反叛的代名词,其神话再次成为此时作家们偏爱的题材。歌德的《普罗米修斯》创造了蔑视天神形象;拜伦的《普罗米修斯》书写了在酷刑面前绝不低头的抗争者;雪莱的《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则不向长期压迫妥协,终推翻朱庇特统治。尽管“在赫希俄德的史诗中,普罗米修斯向宙斯屈服了;在埃斯库罗斯的悲剧中,普罗米修斯与宙斯和解了”(余冰,2002:47),但这个时代普罗米修斯不仅没有屈服或和解,他的反叛反而更为彻底。

如果说普罗米修斯形象的演变显示出时代的知识型,反映了特定时代的审美趣味,那么,这一时期文学作品中普罗米修斯的共同特征就是彻底的反叛精神。法国大革命的失败和英国的阶级冲突深刻地影响着英国知识分子,普罗米修斯也因此成为反抗现存思想秩序的载体。在《弗兰肯斯坦》中,怪物便承载了该时代普罗米修斯反叛的特征。对怪物而言,人类就是他的神,当他对维克多和人类社会彻底失望后,他也像普罗米修斯反抗宙斯和天庭秩序那样,竭力向自己的造物主和人类的秩序发起挑战。

最初挑起怪物反抗之心的是他遭到的偏见。由于相貌丑陋,怪物再三被人类误解、伤害,这映射出小玛丽因父亲写的《回忆录》而饱受世人非议的经历。除此之外,怪物被排斥在群体之外,还影射着当时盛行的种族主义。19世纪的英国“压迫别人的倾向表现得比任何其他时期都更显著”(勃兰兑斯,1984:20),黑人、印第安人、南美洲人都被白人看作征服、教化的对象。怪物显然比任何民族的地位还要低下,处于被压迫的最底端。

此后,在观察德拉西一家的过程中,怪物对等级制度和社会不公的认识进一步激发了他的反抗情绪。玛丽·雪莱以此指代该时期欧洲神圣同盟和英国贵族资产阶级的黑暗统治。反抗剥削的卢德运动直到1816年都还在遭受英国国会的血腥镇压,“在兰开斯特,8人被判处死刑。在切斯特,15人被判处死刑,4人被绞死”(Rude,1964:85)。需要指出的是,玛丽·雪莱最初构思《弗兰肯斯坦》是在1816年的夏天,怪物的思考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这一事件对她的冲击。1815年拿破仑的陨落,

对玛丽而言,“意味着大革命的失败和专制的复辟”(胡布勒,2008:111)。就文本来看,维克多就是当时欧洲封建复辟势力的象征,怪物的反叛则隐喻了人民对压迫者的抗争。

然而,怪物的反叛却是基于他未完成的、部分错位的启蒙。对于怪物来说,自己存在的根基由《失乐园》塑造,从菲利克斯教的历史血腥法则中,怪物又学会了制造灾难,并对贾斯汀实施嫁祸。他相信自身并不健全的理性,将所有人类都视为维克多的同盟,选择以杀害无辜生灵的方式来反抗压迫。殊不知,这种选择恰恰是理性被激情压倒的结果。

在古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盗取天火之后,宙斯给人类制造了带来不幸的潘多拉魔盒。实际上,怪物身上同时具有“火种”与“潘多拉魔盒”的双重特征。因为世人的偏见,他逐渐从一个帮助人类收集柴火的“火种”,转为给人类带来灾难的“潘多拉魔盒”。

纵观玛丽·雪莱之前的文学作品,普罗米修斯的反抗往往是宽恕和隐忍的。怪物的形象显示出当普罗米修斯转向暴力反抗时可能会引发的灾难。由于怪物谋杀弟弟、陷害贾斯汀、间接导致父亲死亡的地点都在日内瓦,我们很容易联想到作者在隐射日内瓦的暴力革命。怪物同那些受迫害者一样,因为暴力革命使得这场斗争以悲剧结尾,暴力血腥的行为也让怪物彻底失去融入人类社会的可能性。玛丽·雪莱曾在日记中写道:“我并不赞同暴力极端的行为,那只会引起受伤的反应”(胡布勒,2008:368)。她希望通过激励读者充分克服偏见来接受根本性的改革,以防止持续的不公正和暴力革命。

此外,怪物观察的对象菲利克斯也构成了另一位“反叛者普罗米修斯”。普罗米修斯不认同神的规则,出于同情人类,打破神的秩序;菲利克斯则不认同人的法规,出于对萨菲父亲的同情,违背了人的法律。在普罗米修斯与神界的对抗中,宙斯的力量强大,而普罗米修斯孤立无援;同样,在菲利克斯与不合理法制对抗的斗争中,统治阶级的力量是压制性的。普罗米修斯因为盗火获罪,成为正义的殉道者;而菲利克斯因为救人而入狱流放,牵连全家。然而,相较于普罗米修斯,菲利克斯的反抗却是盲目而冲动的,他的营救不仅没有换来犯人的感激,还因为敌我力量悬殊给家人带来了不幸。

现代性注重个体权利和自由意志，它赋予人们批判的理性，并在精神层面强调人们不要服从传统权威，而要成为具有独立判断能力的主体。在此影响下，怪物和费利克斯拥有反叛权威的勇气，亦生成了对现存制度的批判。然而，随着“主体性被提升为错误的绝对者”（哈贝马斯，2011：64），他们充斥着对自身理性和力量的盲目信心，深信个体对命运的掌控权，并试图僭越神的能力，扮演“现代普罗米修斯”的角色，竭力以一己之力打破现有秩序，完成对现实的翻转。玛丽·雪莱在文本中构建二人的悲剧结局，以探讨高扬主体性的潜在危险。

六、结语

在人与自然的抗争中，普罗米修斯之“火”为人类带来了先机。然而，当“火”在《弗兰肯斯坦》中以“电”和“磁”等方式再次出现时，这一先机却加剧了人与自然的冲突，这展现了现代科技对人类本性的异化，暗含玛丽·雪莱对现代性困境的揭示。在宗教祛魅的时代，人们拒斥神意安排的目的论，试图以人类理性重新解释世界，相信能以理性改造并支配自然。弗兰肯斯坦、怪物、费利克斯和沃尔顿都不满足于仅驾驭世界的力量，而是力图成为现代普罗米修斯，按照自己的意愿塑造世界。玛丽·雪莱表现出高度的对人类中心主义的隐隐担忧。因此，文本中的角色愈是接近现代普罗米修斯，就愈接近毁灭。她以这种方式警醒人类：人的理性有局限，想成为现代普罗米修斯，以一己之力改变世界是荒谬的。

通过梳理古希腊普罗米修斯四重身份在《弗兰肯斯坦》中降格化呈现，副标题“现代”一词的“现代性”内涵便可见一斑。玛丽·雪莱虽然没有直接使用“现代性”一词，却在文本中揭示并反思了现代性的困境与危机，这显示了其在文学史中的开创性意义。

“现代”一词虽然早已出现，但它更多指向时间的断裂。直到16世纪，通过不同语言的译介，它才有了“当前”的含义，不过那只是“瓦萨里为了定义一种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风格而使用的”（吉莱斯皮，2012：11）。1672年，“现代性”一词在《牛津英语词典》中首次以英文出现，彼时其定义仍为“现今时代”（卡林内斯库，2002：49）。哈贝马斯指出，“黑格尔是第一个清楚阐释现代概念

的哲学家”（哈贝马斯，2011：5），他看到“现代世界的优越性和危机所在”（哈贝马斯，2011：19）。然而，在黑格尔用德语表达“现代性”之后，哲学界对于现代性的探索出现了停滞，“这种状况直到二十世纪才有了变化”（哈贝马斯，2011：61）。可以说，玛丽·雪莱与“第一位意识到现代性问题的哲学家”（哈贝马斯，2011：51）黑格尔，几乎在同一时期看到了现代性的危机。毋庸讳言，她走在大多数同时代的哲学家前面。早在20世纪哲学界对现代性议题进行集中探讨之前，玛丽·雪莱已预先感知到了现代性的困境。

在文学文本实践中，1819年出版的《弗兰肯斯坦》在对现代性的思考上也具有先锋性。“现代性作为一个概念始于波德莱尔”（汪光晔，2023：12），他的《现代生活的画家》（1863年）从审美角度对现代性作出界定。在此之前，霍勒斯·波顿尔曾在关于查特顿《罗利诗歌》（1777年）的争论中使用过“现代性”一词，但其“含义是有关语调的”（卡林内斯库，2002：49）。伊夫·瓦岱则称，“现代性”在法国文学作品中第一次出现在巴尔扎克的《百岁老人》（1822年）中，用法语以表达“现代时期”（瓦岱，2001：20），之后又出现了在夏多布里昂的《墓外回忆录》（1849年），用以描述“海关的现代性”（瓦岱，2001：21）。显然，巴尔扎克的“现代性”并未脱离时间概念，夏多布里昂虽提及现代生活的乏味，却未对现代性挑战进行思考。除去欧洲语种对“现代性”的细微差别，玛丽·雪莱则在他们之前就以“现代”表达了“现代性”意味，触及现代性的特质与困境。可以说，玛丽·雪莱是小说史上第一个明确思考现代性并意识到现代性危机的作家，这意味着《弗兰肯斯坦》不仅在科幻小说史上具有先驱地位，它还开拓性地以文学形式探索了社会与哲学领域的现代性问题。

参考文献

- [1] George Rude. The Crowd in History: A Study of Popular Disturbance in France and England [M].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Inc, 1964: 1730-1848.
- [2] 勃兰兑斯. 十九世纪文学主流4: 英国的自然主义 [M]. 徐式谷, 等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

- [3] 查尔斯·泰勒. 世俗时代 [M]. 张容南, 等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6.
- [4] 查尔斯·泰勒. 现代性之隐忧 [M]. 程炼, 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
- [5] 茨威·韦布洛斯基. 路西弗与普罗米修斯 [M]. 吴雁翔, 译.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20.
- [6] 多萝西·胡布勒, 托马斯·胡布勒. 怪物: 玛丽·雪莱与弗兰肯斯坦的诅咒 [M]. 邓金明,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 [7] 郝田虎. 《失乐园》《弗兰肯斯坦》和《机械姬》中的科学普罗米修斯主义 [J]. 外国文学, 2019 (1): 3-14.
- [8] 马克斯·霍克海默, 西奥多·阿多诺. 启蒙辩证法 [M]. 渠敬东, 曹卫东,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0.
- [9] 马克斯·韦伯. 学术与政治 [M]. 冯克利,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8.
- [10] 马泰·卡林内斯库. 现代性的五幅面孔 [M]. 顾爱彬, 李瑞华,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2.
- [11] 玛丽·雪莱. 弗兰肯斯坦 [M]. 孙法理,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6.
- [12] 米歇尔·艾伦·吉莱斯皮. 现代性的神学起源 [M]. 张卜天, 译. 长沙: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2.
- [13] 汪光晔. 论现代性的概念及其哲学确证 [J]. 系统科学学报, 2023 (3): 12.
- [14] 汪民安. 现代性 [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 [15] 伊夫·瓦岱. 文学与现代性 [M]. 田庆生,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 [16] 于尔根·哈贝马斯. 现代性的哲学话语 [M]. 曹卫东, 译. 北京: 译林出版社, 2011.
- [17] 余冰. 欧洲文学中普罗米修斯形象的嬗变 [J]. 河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2 (5): 45-47.

Prometheus of Degradation —The Modernity Predicament in *Frankenstein*

Ai Shiwei Wang Mengxiao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Wuhan University, Wuhan

Abstract: The subtitle of *Frankenstein*, “or the Modern Prometheus”, is quite meaningful. The fourfold image of the traditional Prometheus as “man-maker” “fire-stealer” “seeker of knowledge” and “rebel” becomes fluid references in Mary Shelley’s text. These four images are forced to degrade in the modern context: the Creator becomes the Demon of creation in the era of disenchantment with religion and enchantment with science; with increased individualism and a shift towards punishment, the fire thief evolves into “electricity thief” (Victor) and “magnetism thief” (Walton); the enchantment of instrumental reason turns “knowledge seekers” into “knowledge abusers”; for the rebels, critical reason gives them the courage to challenge authority, but the overemphasis on subjectivity makes them forget their own limitations, which leads them to fall from being martyrs for justice into the ranks of violent revolutionaries. The reshaping of the fourfold image of Prometheus shows Mary Shelly’s revelation of modernity predicament. Her use of the word “modern” to refer to “modernity”, not only is groundbreaking in the history of literature, but also ahead the intensive discussion of modernity in the field of philosophy.

Key words: *Frankenstein*; Mary Shelley; Prometheus; Modernity